

刘星红 刘小楠 袁小牧 编



NLIC 2970741443

蔡定劼访谈录

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CHINA



蔡定剑 访谈录

刘星红 刘小楠 袁小牧 编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蔡定剑访谈录 / 刘星红, 刘小楠, 袁小牧编.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5

(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ISBN 978-7-5118-2090-7

I. ①蔡… II. ①刘…②刘…③袁… III. ①蔡定剑
(1955~2010)—访问记 IV. ①K82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5838 号

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蔡定剑访谈录

刘星红
刘小楠 编
袁小牧

责任编辑 易明群
装帧设计 后声文化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版本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张 21.75 字数 390 千

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吕亚莉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 ISBN 978-7-5118-2090-7

定价: 49.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话语产生结构(代序)

季卫东

制度改革的时代特别需要知行合一。可以说,正是1979年以后中国巨变的形势,造就了像蔡定剑这样知行合一的宪法学家,让他在法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手把红旗涛头立,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作为学者型的官员和管理型的学者,他既能摆脱衙门习气和刀笔吏心态,同时又能发挥一个纯学者所不能发挥的媒介作用和影响力,大幅度缩短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他在不经意间还建造了一扇中国式的“旋转门”,让国家权力机关与大学校园之间出现了人来人往、思想交流的绿色通道。至于知与行究竟能结合到什么程度,在这本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访谈集里,你可以找到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

我与定剑相识十五年。作为同乡、同学、同道,我为他英年早逝而深感悲痛,还有政法界同仁的悼念,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但透过大众传媒的报道和互联网资讯可以看到,还有许多素昧平生的人们也在各地、各行各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为定剑哀思,其规模,其程度,似乎有些出乎意料。尤其是“世上已无蔡定剑”这句简短而意蕴复杂的标语,给人以非常深重的震撼,也给人留下了极其广阔的想象空间。或许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其存在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一旦他离开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就突然呈现出来,让你我都触目惊心。像蔡定剑这样富于理想精神和良心的官员已经失去了;像蔡定剑这样富于操作技能和理性的宪法学者已经失去了。官方和民间都应该开始自问:还有什么可以失去?还有什么可以得到?在这个意义上,对一个人的悼词,会化作对一个时代的挽歌。

依我所见,斯人已去所造成的损失之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而日益彰显。由于他有着为民主法治的信念而不眷恋官位、不畏惧牺牲的经历和高风亮节,会产生很强的凝聚力和说服力,无论他提出多么温和的意见和建议,都比较容易被激进派所接受,可以在政治观点交锋中扮演调解者、仲裁者的角色,促进理性对话以及共识的形成和维持。反过来,由于他有着法律专业素养和从政经验,无论别人提出多么激进的意见和建议,他都可以因势利导,并在进行技术性加工处理之后适当转写到制度的框架里。这意味着他有可能成为国家体制转型之际的第一批中国式“忠诚的

反对党”，或者说摒弃了民粹主义、复仇主义等情绪化偏颇的“理性的民主派”，确保渐进的政治变革能够“软着陆”。可惜他的身躯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无法在未来的格局中折冲樽俎、协调阴阳。他个人的纠结和烦恼倒是已经一了百了，但我们这个国家的纠结和烦恼或许将会千倍万倍。

翻阅这本访谈录的原稿，我会回忆起与定剑共处的那些时刻，虽然不多、不长，但却每每印象深刻。记得2007年5月他邀请我到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讲演，一路上通过手机接受了几个记者的采访，有关于立法草案的，也有关于热点案例的。2001年初夏，日本广播电视大学拍摄关于中国法的教学片，我和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六本佳平教授曾经就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议决程序采访他，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小楼里侃侃而谈的情景也恍如昨日。我们初次见面是在1995年早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的一场法学国际研讨会上。那时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位中坚干部，毫无思维僵化的缺陷，既能保持清醒的批判理性，谈吐又很温文尔雅且富于建设性，这次晤谈使我对他产生了很强的好感，也对中国法制发展的未来产生了很强的信心。

2009年4月我正式到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就任之后，因为他在上海有地方代议机制的合作研究项目，我们数度重逢，有时在讲演会上，有时在咖啡馆里。最难忘的是当年5月9日我到北京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研讨会”，并就风险社会与法制问题发言，定剑也在演讲嘉宾之列。他在结束语中，针对围绕司法改革的言论风向变化颇有微词，强调尽管中国的改革应该渐进和根据客观情况有所调整，但学者还是应该有所坚持，在原则问题不能做墙头草、随风倒，令整个会场为之怔。当时完全没有想到那时他已经身患绝症，在一个多月之后被诊断出胃癌晚期。在其后殊死搏斗的一年半时间里，他的确践行了自己的主张，为民主法治的理想和原则始终有所坚持，并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与定剑的最后一次见面在2010年10月24日上午。应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之邀，我出席23日在和平宾馆召开的关于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国际研讨会，因得知定剑病情再次恶化，约好两位朋友次日早上9点分头出发到他家中探视。当天清晨天气骤变，寒风频袭，阴云密布，到8点钟外面依然一团漆黑，如同深更半夜，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定剑打电话给我们，说在这样的天气里就不必来了。我因到北京的机会和比较有余裕的时间不多，还是坚持去了。出租车开着灯行驶，快到安慧里时天才转亮。在同样布满书籍的客厅里，定剑忍着剧痛与我促膝谈心，从未完成的研究项目到筹备中的会议，从家庭到朋友。在提到正在巴黎政治学院留学的儿子蔡克蒙时，他忍不住掩面而泣。

他是一个极其坚强而乐观的人，即使知道死神的脚步在接近，也依然神态自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落泪，而且如此难以自抑。感情稍微平息后，他介绍了克蒙的近况，希望爱子学成后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因为傍晚在上海还有外事活动的预定，我不

得不搭乘中午的航班离京,聊到不能再迟的时候,定剑不断催促我动身。在告别之际我拥抱了他一下,眼泪再次涌出。他忍住伤感告诉我怎么走出小区打的,让司机如何行车才最快捷。坐上出租车后,我收到他的短信,把通往机场的路线写得一清二楚。在登机口,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已经顺利赶上航班,他很高兴,又互相说了祝福的话。没有想到他的病情急转直下如此之快,这一声珍重竟成永诀。

花圈、悼词、追思会、纪念文集在不断提醒我:“世上已无蔡定剑。”但是,他的音容却仍然长留这个世界,在照片和录像带里,在专著和论文里,在中国法制与社会发展的轨迹里,在星红和克蒙以及每一位亲友的记忆里,当然也在这本即将付梓的访谈录里。尤其是他对中国法制与社会变迁的具体思想和论述,将会逐步化成新制度的建筑材料,不久后势必以另一种形式大放异彩。现在盖棺而论定,他的人格文章是永垂不朽的了。而作为同乡、同学、同道,我宁愿相信他将永远活在我们中间,还会继续与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同呼吸、共命运。

是为序。

季卫东

写于2011年元月雨天

目 录

第一编 政改之思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30 年与改革的新动力

——“燕山大讲堂”演讲 / 3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的方向

——搜狐网《第一时评》访谈 / 17

政治体制改革仍需解放思想

——阳光卫视《观察家》访谈 / 27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权力关系的调整

——阳光卫视《论衡》访谈 / 34

宪政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阳光卫视《观察家》访谈 / 43

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 使中国走上真正民主的

康庄大道

——《新民周刊》记者专访 / 50

政治体制改革方能实现人大的制度功能:人大五十年三人谈

——《浙江人大》记者专访 / 59

人大专职常委应避免行政化 强化议事能力

——《21 世纪经济导报》记者专访 / 66

没有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的改革很难奏效

——《南方都市报》记者访谈 / 69

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

——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演讲 / 74

全民直接普选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发展方向

——人民网《强国论坛》访谈 / 79

《选举法》修改的得与失

——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访谈 / 89

第二编 民主之辩

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南方周末》记者访谈 / 97

民主仍需启蒙

——阳光卫视《观察家》访谈 / 105

民主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岭南大讲坛”演讲 / 117

被误读与忽略的新加坡经验

——《南风窗》记者访谈 / 130

公众参与：推动社会转型的日常民主

——“岭南大讲坛”演讲 / 136

公众参与与政府决策

——三味书屋演讲 / 141

新闻自由是社会稳定转型的积极因素

——《经济观察报》记者访谈 / 165

中国需要一场伟大的平权运动：政治权利第一，社会福利第二

——《南方周末》记者访谈 / 173

第三编 宪政之道

中国百年宪政史和当前宪法实施之路

——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系列报告会演讲 / 183

宪法诉讼大有可为

——腾讯网记者访谈 / 200

公共预算改革 建设真正法治政府

——阳光卫视《观察家》访谈 / 211

政府的钱袋子如何阳光透明

——深圳卫视《22 度观察》访谈 / 222

如何全程看紧政府的“钱袋子”

——《南方周末》记者访谈 / 233

追问政府的钱袋子:公共预算改革与公众参与

——“宪政讲堂”演讲 / 239

《监督法》的主旨应是加强而非限制人大监督

——《商务周刊》记者访谈 / 255

反腐败 制度建设比反贪机构更重要

——凤凰卫视《华闻大直播·焦点追击》访谈 / 261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核心是官员财产信息公开

——《财经》记者专访 / 264

第四编 人权之维

拆迁条例违宪违法

——《财经》记者访谈 / 271

解决拆迁问题的根本之道:改变政府利益导向、推进公众参与、改革土地所有制

——腾讯网《中国观察》访谈 / 276

正当合法的拆迁程序及法律制度

——“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演讲 / 289

从宪法权利看流动摊贩合法化

——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访谈 / 296

反就业歧视:别让“集体无意识”戕害公平

——《解放日报》记者访谈 / 310

反对就业歧视 促进就业公平

——人民网《强国论坛》访谈 / 313

就业歧视何时了

——《中国教育报道·周末聚焦》访谈 / 323

附录:一位宪法学者的公共担当情怀

——《交大法学》对蔡定剑教授的访谈 / 330

第一编

政改之思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高速增长的 GDP,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由“共识”转向“分化”。经济的发展是否足以证明政治体制改革已是明日黄花?三十余年间政改究竟走过怎样曲折的道路?当下政改的阻力与动力分别是什么?目标何在?应往什么方向发展?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首要步骤应该是什么?这一步骤又有着怎样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这些时下为学界、媒体与社会所高度关注与热烈争论的问题,在本编所汇集的蔡定剑先生访谈中一一得到呼应。这些呼应不仅来自书斋中的博学与慎思,亦来自实践中的明辨与慎行。先生是政改的亲历者,不仅参与了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政改的研讨,还参与了历年来宪法、法律的修改以及地方政改实践的尝试。据此,他历数政改的历史与得失,从 1978 年至 1989 年反思文化大革命、削弱个人集权的全面改革,到数年徘徊后,1992 年起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改革止步不前的失衡;他剖析政改的背景与变化,从观念性的改革共识、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行动,到利益分化的改革群体、源自社会的改革诉求。“绝知此事要躬行”,对政改实践的参与,使先生看到阻力在于思想禁锢与既得利益,动力在于公民社会的成长;深知各方力量博弈的复杂性与推行政改的难度,主张渐进的改革方式,逐步实现民主化。“学者应当有所坚持”,独立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又使先生始终保持清醒,看到 GDP 的实际构成与其所反映的分配构成之失衡、权力关系构成之扭曲,指出只有在经济改革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才能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分析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可能的风险,指出政改已刻不容缓,亟须把握时机,才能争取平稳转型;进而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宪政,方向应该是民主化,目的是维护人权,内容则包括选举制度的改革、权力的合法化与监督制约、行政体制的改革、法治建设,其中以全民直接普选为方向的选举制度改革应是首要步骤,以人大制度改革为依托的权力关系调整则是核心所在。

本编共收集了 12 篇访谈,其中,6 篇分别就政改的历程、动力阻力与必要性、内涵等方面做出深刻的阐释,6 篇分别就选举制度、人大制度的改革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讨。用“思”作为全编的题眼,既因为这是先生的深思之语,也切合先生对知识分子中立立场的恪守与虚怀若谷、不肯轻易下断语的谦逊。本编也可视为全书的纲要,其关于民主、宪政、人权的论述将在以下三编中得到进一步深化与丰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30 年与改革的新动力*

——“燕山大讲堂”演讲

演讲时间:2008 年 12 月 3 日

“过去那场靠观念支撑的改革已经过去了,改革的动力在哪里?2002 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这个变革以公民社会的出现为迹象。基层公民的维权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改革。”

“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有两点,一是思想的禁锢,二是既得利益。思想禁锢,需要克服政治改革的‘两个凡是’:‘稳定压倒一切’论和‘国情特殊’论。”

“当前我们社会处于诸多矛盾高发期,我们的领导人已经高度意识到社会危机,所以提出和谐社会建设。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只通过政策调整,而不通过制度改革达此目的?我认为是非常困难的。”

“互联网的发展,使公民有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表达的空间,成为对公共政策和政府官员进行广泛舆论监督的力量。这场改革围绕的是法律和权利的实现,而不是观念和理论的讨论。对法律和权利的解释,使政府权力不断受到来自公民社会的挑战和约束。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件好事。非政府组织,我们不要把它理解为反政府组织。维权是一种好的事情,不是坏事。”

“新一轮的政治改革,要以宪政为政改的目标,以选举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以落实强化人大制度为依托,以公共预算和政府透明为行政改革的重点,以司法独立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

* 来源:2008 年 12 月 9 日腾讯网《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第 19 期。

主持人(《腾讯评论》主编张东生):大家晚上好!欢迎参加第19期“燕山大讲堂”。我是《腾讯评论》主编张东生,很荣幸主持今天的讲堂。蔡老师是政法大学的教授,也是政法大学的毕业生,1998年在北大获得博士学位。蔡老师的人生经历很丰富,他1983年至1986年是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1986年至2003年很长一段时间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历任副处长、处长、副局长。蔡老师2004年回到政法大学做教授,目前担任宪政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也兼任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

燕山大讲堂一般是在周六举行,这次为什么选择在今天呢?因为明天是宪法颁布的纪念日,这是个有着特别意义的时间。蔡老师今天的题目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我们掌声有请。

蔡定剑:大家好!非常感谢光顾“燕山大讲堂”,关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谢谢腾讯网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举办这样一个讲座。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很多演讲会、报告会,但是讲政治体制改革的确实很少。我觉得我们不能避开这个题目,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样,需要反思、总结,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

我是30年的经历者,同时也是参与者。由于工作机会使我可以接触一些高层信息。1988年、1989年时,我刚到全国人大不久,也参与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后来我被抽调到十三大报告起草组下面的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参与了部分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之后我也参与了一些重要的事件,包括全国人大一些制度、《宪法》的修改。我们曾经试图在深圳搞政治体制改革,如深圳特区立法权的授予和深圳人大的建立,所以说我是一个参与者、经历者。

我今天想介绍三个题目:第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现状。第二,政治体制的阻力和动力在什么地方。第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回顾与现状

1978年是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在“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反复强调,从文化大革命得出的经验教训就是要发展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些话至今仍然是经典。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些年来支撑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这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确立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没有消失的意义。

此后,我们马上就进入了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建设。1979年,修宪和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将县一级人大代表改为直选。198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邓小

平在会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政治体制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克服这些现象,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1981年有一部名叫《苦恋》的电影,这是一个军队作家写的电影,写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华侨画家,他很爱国,但是这个电影的最后一句问了一句:“你爱这个国家,但是国家爱你吗?”因为这层意思,这个电影被认为是灰暗、低调的电影,没有上映。这是当时带有文化性、政治性的事件。

1978年至1982年,中国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整个社会焕发出一种解放思想的活力,这是一个要求民主自由、政治改革呼声比较强烈的时代。在这个时期,进行了30年来第一次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是制度性的,不是思想观念性的。我们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最后总结在《宪法》里面的我认为有四条:

第一,在选举制度方面实行了差额选举。从人大代表到国家领导人副职都实行差额选举,地方的和中央的正职在法律上也实行了差额选举;还实行了代表和选民可以联名提名的制度,过去基本上是组织提名。北大和其他一些高校出现学生主动站出来竞选人大代表。北大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竞选人物,在图书馆和饭堂前面作演讲,赢得了掌声。

第二,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度建设,增强人大常委会的能力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成为了一个主要的立法机关,而且这个立法权在某种程度上比代表大会的还要大。全国人大制定民事、刑事、国家制度和重要经济方面的基本法律,除此之外的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可以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部分修改全国人大的法律。其二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我们知道专门委员会对议会的作用,《国会政体》一书的作者威尔逊有一句话:“专门委员会是行政中的国会,没有专门委员会议会不可以做事。”

第三,扩大了地方的自治权,设置了地方人大常委会。1982年《宪法》里很重要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地方建立了一个常设的议会。在西方很多单一制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它有立法权,这个权力是很大的,只要跟国家的宪法、法律不相抵触,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法律。国家法律没有列明的它也可以做。当然我们习惯于中央集权的思维方式,总是看到上面领导有什么指示才立法,这不是宪法制度的安排。其实我们地方立法权比英国、日本、法国单一制的国家的自治权力要大得多。我去英国专门研究过英国地方自治的问题,英国到1999年才开始权力下放,原来地方没有议会,没有立法权。

第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解决了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就解决了领导人权力接替转移的问题。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国家怎么办

啊？那年很多人排队买黑纱，整个国家都一片暗淡。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交接，我们不可能有这30年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成果是1982年《宪法》固定和总结下来的。

接下来，由于自由、开放了，有些新的生活方式来了，包括西方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是人的本性的生活方式，如穿喇叭裤、跳舞，聚集在一块，这些事情都来了，包括一些社会治安的问题。1982年8月，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决定》和《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程序决定》，我们把这个叫做“严打”。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可以看到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两种思想在交锋。1983年4月，发生了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争论。周扬是当时的中宣部部长，他在中央党校做了“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报告，批评检讨我们过去对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太“左”了；后来遭到了党内另外一些同志的反对。关于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是很有名的作家，也是1957年反右灾难的制造者；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反思得比较深刻。1984年，胡乔木针对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做了一个报告——《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在1986年9月3日、13日、29日和11月9日，邓小平连续四次谈政治体制改革。他先后指出不搞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内容首先是要党政分开，要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二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三是精简机构。然后进一步提出，我们要讲民主，但不要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

这是中国第一阶段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改革的背景是反思我们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要民主，要法制，要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个人集权和个人专断的问题，要解决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改革的动机就是要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情再发生，我们不应该再有文化大革命那种乱批人、乱斗人、乱抓人的问题，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改革的特点是以传统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发起的一场又一场观念的变革，如关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实际上是在哲学层面上谈人性、人道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挖掘人道主义的因素，用这样一些东西来启蒙社会。

在前十年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央最高领导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学生、知识分子、社会也在讲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两种政治体制改革有不一样的内涵：在知识分子、学生看来，更多的是自由、民主、竞选这些东西；但是政治领导人层面上的民主，是在我们现有制度下，怎么能够进一步发扬民主。人文知识分子强调的观念头脑风暴的改革，与权力驱动的改革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没有权利的要求，只知道民主是好

的,西方的一些东西是好的,学生也完全不了解西方。这种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在发动、推动,这次改革成功体现在1982年《宪法》中。改革的普遍共识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

1989年以后有几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中国都处于徘徊的状态。1992年,邓小平南行打破了这种局面,一下子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到了最前沿,市场经济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期间发生了苏联、东欧解体的事件,给中国老百姓、特别是领导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是我们下一场改革很重要的背景。在东欧解体以后,很多人认为中国不能搞西方的民主,要吸收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我们什么事都干不成”;在经济上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发展政策,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在国际上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

从1992年到现在16年间,中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第四的国家,在世界上成了一个巨人,中国的富豪榜在增长;在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到处购买外国的银行、企业、保险公司,我们有数千亿元的投资。

第二阶段的改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在第二阶段,每一次十几大的报告文件里面也谈政治体制改革,但实质上我们没有看到制度上的安排。整个社会埋头搞经济建设,带来了财富的增加,但我们失去了亲情、友情和道德,我们的价值体系基本上是崩溃的,几千年来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瓦解。我们迎来了世界资本,我们产生了一代富豪,但是我们增加了贫富差距和代沟。我们实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赶超西方强国的梦想,今年的奥运给中国人长了民族骨气,同时也让我们有了非常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好的方面,也会伤害一些东西。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清末的义和团就是这样,它打着爱国的旗号,不分青红皂白见洋人就杀,给国家制造了麻烦。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不要说因为爱国所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

改革带来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但是政府本身的利益也在增加,政府本身也是利益主体,跟社会争利益。政府有更强的能力,我们说市场经济改革要转变政府的职能,要缩小、限制政府的权力;但是由于经济能力和其他管理制度的变革,实际上政府的能力在提升。我们产生了一代中产阶级,但是我们有些中产阶级不太需要改革。

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向何方呢?我认为,过去那场靠观念支撑的改革已经死亡了,已经过去了。我们过去的青年知识分子、学生热衷于改革,他们没有利益的支撑,是观念性的改革。但是,我认为新的改革正在萌生,就是市场经济土壤中产生的、来自社会层面的极力要求的政治改革正在萌生。

总结第二阶段,1989年以后,(在钱与权结合推动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在1992年后单兵突进。最近张五常先生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是县级的竞争,我写了文章批

评,我认为最大的东西就是权与钱的结合。地方政府推动经济改革,用各种政策、优惠办法来创造投资的环境。这个环境不是法律的环境,也不是民主的环境,是一种资源的环境,以劳动力、环境资源、土地为代价的环境。这是权力与资本的蜜月期。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转向。知识分子与政府的联盟出现裂痕,传统人文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一部分强调经济效率的经济学家登上舞台。在意识形态淡化的同时,传统的、新中国建立的道德体系和信念也在消失。随着经济改革成果和经济繁荣的出现,部分政治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在这期间,一些与政治改革有关的行政、司法改革都无果而终,如基层民主自治、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司法改革、公车改革、反腐败等,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渐式微。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了,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反而成了一个问题!

1982年以后,每五年搞一次机构改革,应该说是很有成果的,政府发生了很大的转型,直接管理经济的部门已经没有了:我们知道原来光机械工业就有8个机械工业部;早期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有七八个办公厅。这些管理经济的部门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是有相当多的机构问题没有解决,如这次期待的大部委制。我刚刚去过德国,德国司法部接待我们,我问了他们的职能,原来德国司法部相当于我们的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检察院和公安部。美国的司法部也是这样。我们还存在相当大的机构问题。

此外,政府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我们习惯用那种遇到事情就管理,遇到事情就监督的思维方式。这些年来哪个方面出问题,哪个机构就得到加强。海关走私严重,我们把海关从副部级提到正部级;土地管理出问题,我们把土地管理从原来的副部级提到正部级;安全生产出问题,煤矿各种事故多了,我们也把它提到正部。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监督机关,但效果怎样呢?我曾经组织过“中美矿山安全事故立法比较的研讨会”,请了美国的相关专家和中国人大、安全生产部门的专家一起讨论。我们原以为自身法律上不够完善,一比较发现国外专家说的安全生产制度,我们中国专家也能讲出来,一点也不少。在监管机构方面,美国的安全生产总局是劳工部下面的一个局,我们是一个部,他们大概几百人,我们有好几千人。我们差什么呢?他们的安全生产最重要的是靠劳动者,劳工可以建立自己的组织,他们有自己的安全员,他们有自己的工会,他们的老板不可说你举报,我就把你开除。他们的安全生产员直接跟安全生产部门联系,超过安全指标的时候,马上就要报告,这是他的责任。美国是这些制度在起作用,而不是靠我们的监察大员、钦差大臣。美国的露天煤矿一年检查两次,下面挖的煤矿一年检查四次;我们检查的频率比他们高,这么大的机构,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